

大师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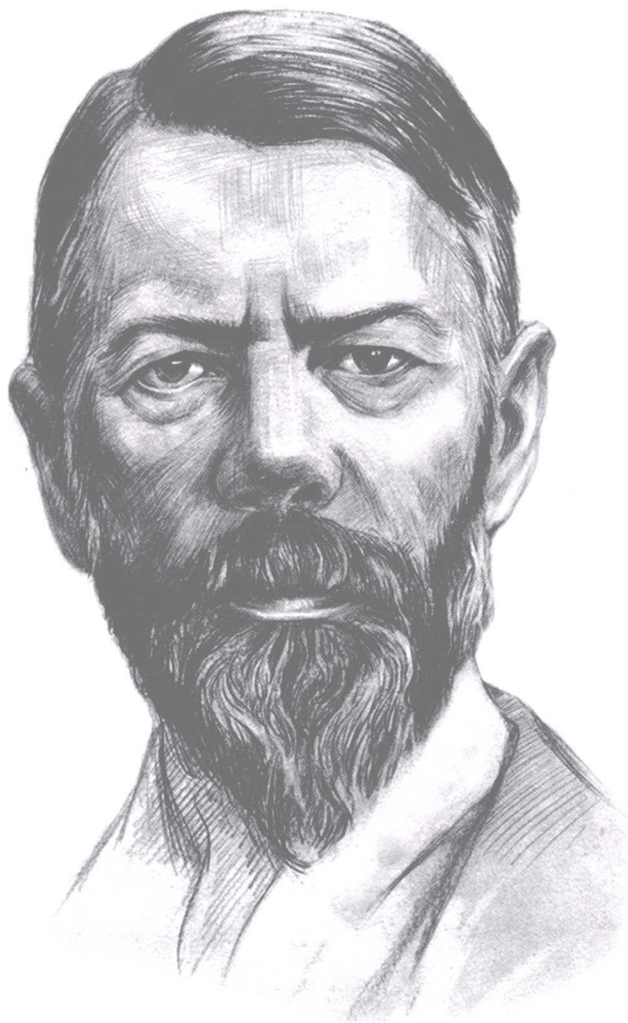
经典通读
第二辑

通俗阅读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经济与社会

在制度约束和个人利益之间博弈



(德) 韦伯 著

杭 聪 编译

北京出版社


· 经典通读 ·
第二辑

经济与社会

Weber

(德) 韦伯 著

杭 聪 编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与社会 / (德) 韦伯 (Weber, M.) 著; 杭聪编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9
(经典通读)

ISBN 978 - 7 - 200 - 07316 - 4

I. 经… II. ①韦…②杭… III. 经济社会学 IV. F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6921 号

经典通读 第二辑

经济与社会

JINGJI YU SHEHUI

(德) 韦伯 著

杭聪 编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集 团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发行

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2 印张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978 - 7 - 200 - 07316 - 4/G · 3723

定价: 23.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63973790 010 - 58572393

写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前面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出版一年了，20册经过全新编译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著作一经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美者有之——对西方经典学术著作进行通俗化的解读，让普通读者也能了解西方的文化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批判者亦有之——不是大师原著，读来何用？警惕快餐文化向学术圈进逼！

回忆丛书策划时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休谟、康德、马克思、牛顿、达尔文等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大师的无限敬畏，以及对其伟大著作的只闻其名未见其详的无比难堪，可以说《经典通读》丛书实现了“大师经典，通俗阅读”的出版目的，完成了把艰涩难懂、鸿篇巨制的学术著作，转化为普惠大众的精神食粮的任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10万字左右的通俗读本，有多少人会真的捧起《政治学》、《政府论》、《资本论》、《人性论》、《战争论》、《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相对论》……并能坚持读完？这就是《经典通读》的功绩，这就是为什么一套20册的学术书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累计销售30多万册的原因。

可以说学界对《经典通读》的出版是宽容和肯定的，大多



数专家学者开始明白，学术经典不该只是象牙塔中供少数知识精英把玩的古董，它们代表了人类文化思想的精髓，应该发挥其“以文化人”的作用，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些经典，了解这些经典，汲取人类先贤们的文化营养，分享人类思想的丰硕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袁济喜认为，研读西方经典，对于提高国人素质是必要的。中国自古以来便重视知识的通俗化，《三字经》、《千字文》就是经典通俗化的代表。从文化的长远发展来看，通俗的编译本是必然的，也是可取的。就坚持阅读品位、坚持图书导向来说，这套《经典通读》丛书也是很有意义的。

著名经济学家邢国均研究员说：当今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使得跨学科的研究很普遍。比如经济学研究者可能希望了解一些哲学理论。而有些著作往往篇幅过长，且理论艰深、晦涩难读。如果有可靠的普及本，读者就可以对原著有一个概要性的把握和初步的了解。另外，对于初次接触某一新的知识领域的读者来说，对某些理论的理解可能不是很有把握，通读本就能起到引导的作用，读者可以参照编译者对原著的理解把握这些理论。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加速，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而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是国际化高端人才必备的素质。《经典通读》这样的丛书，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成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桢教授还就国学热背景下的西方经典阅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国学与西学相互碰撞的历史。社会思想潮流的变化也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目前社会上的国学热，其实是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国人自信心增强的表现。以前我们看西学可能是仰视，现在可能就是平视了。也正因如此，才更应该将西学名著通俗化、普及化。另一方面，许多著名的国学家都是中西贯通的大家。如著名的清华大学“国学四导师”，他们除了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都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今天研究国学，也要懂得西学。

正如在《经典通读》第一辑的《编者的话》里写到的，“与世界接轨”，首先就该“让思想先行”。除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对西方经典文化也应积极推广。我们就是要打破这种传



播中的壁垒——几十万上百万字的沉重篇幅，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要做到这点，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关键。换言之，再好的著作，读的人少，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的出版，受到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等100多家媒体的关注，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网站也纷纷进行深度报道，其中人民网还针对这套丛书进行了读者调查，让大家发表对这套书的看法。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广大读者非常欢迎这样的作品，认为这是能让他们阅读这些经典的最好办法。而在全中国掀起的明星代言《经典通读》活动更是引起舆论关注，众多媒体以大幅版面介绍本丛书和大家投票选出的代言明星。明星与经典学术著作的强烈反差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策划《经典通读》丛书的初衷。当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票选名列前茅的杨澜时，她表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人文著作，要看它整体的水平怎么样，如果很好的话，作为公众人物，去推荐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来吸引青少年阅读，我觉得对推广文化也是很好的事情。

几千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名著浩如烟海，与第一辑的20册同样重要的著作还有很多。受到第一辑成功的鼓舞，今天我们又推出了《经典通读》第二辑，使丛书的总册数达到40册，涵盖的作者和门类更加齐全和有代表性。

在第一辑中，马克思揭秘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用《资本论》缔造了一个新世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探索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其影响力至今不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创立的“三权分立”学说，是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西方的国家政权模式；伟大的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注定成为人类挑战宇宙的旗帜！

在第二辑中，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通过自己的《沉思录》，解析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使领袖和平民都成为他的读者；卢梭从他的自然人性观出发，认为人生来自由、平等，人人都应享受这一天赋的权利，他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以培养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爱弥



儿》；亚当·斯密期望人类有冷静慎思的能力，而不仅仅受自利的驱动，于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以《道德情操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凯恩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三次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众多国家的经济政策……

《经典通读》第二辑仍然秉承第一辑的出版原则，完全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在保持原作原貌的前提下，将经典大部头进行瘦身，力求提炼出原著精华，在原汁原味中化繁为简地通俗解读大师们的著作。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啃”原著的读者来说，这套丛书能满足大家了解原著的基本需要，有“替代”原著的作用；同时，对于想认真阅读原著的读者而言，它也具备了引导的作用，真正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西方学术经典的大门。

同第一辑一样，《经典通读》第二辑的编译者也均为年轻的学者。他们具有较高的外文水平，并且所编译的著作都在其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就避免了已往有些编译者只懂外语而不懂专业所造成的译稿不准确、不通畅等问题。或许有人质疑年轻人的功底，其实，这些人往往只注意功成名就者的成果，而忽略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只要他们有披荆斩棘的勇力，梳理芜杂、条分缕析的细致与耐心，相信他们一定能奉献给我们期望中的经典。请别忘了，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时年龄不过24岁。

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出版之际，我们想重申《经典通读》第一辑《编者的话》中的观点：“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直接地感受和领略大师的精神风采。”

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是我们的理想，但要真正实现难度却很大。但愿第二辑做得比第一辑好些。不当处，请读者见谅，并欢迎批评赐教。

石岱峰

2008年9月

揭破制度与社会经济行为的关系

——《经济与社会》导读

你如果到德国慕尼黑旅游，可能会看到一个叫韦伯的广场。韦伯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思想大师，这个广场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用一句话赞扬韦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韦伯是一个集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于一身的人物。韦伯的研究面极广，处理政治学问题要谈到韦伯，研究经济问题也要谈到韦伯，在研究法律的产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时同样无法回避韦伯，谈到人类学、史学因果律研究，甚至管理学时也不能不说到韦伯，当然，社会学研究更不能离开韦伯。韦伯以社会学研究闻名世界，也以政治经济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著称，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韦伯与马克思、爱因斯坦一起被人并称为对现代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三个德国人。



1864年4月21日，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州埃尔福特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富裕的新教徒家庭。韦伯的父亲是位知名政治家和公务家，常常有著名学者和公众人物来家中拜访。天资过人的韦伯从小就有良好的读书条件，这种家庭环境，对韦伯宏大思想体系的构建有很大的作用。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后来



也成了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13岁时，韦伯撰写了两篇论文送给父母，标题分别为《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迁徙运动的历史》。14岁时，韦伯的书信中就开始引用荷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人的著作。在进入大学之前，韦伯已经熟读了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理论著作，并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强烈兴趣。但韦伯的青少年时代整体上还是平淡无奇的，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早慧和睿智，在学业上也不够勤奋和刻苦。

1882年，韦伯进入其父亲曾经求学的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就读，并且也加入了其父亲读大学时所加入过的学生社团。主攻法律之外，青年韦伯还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这期间，韦伯的表现更像是一个活跃的纨绔子弟，和同学拼酒、打斗，在决斗场上还差点儿被剑划破了脸。1883年，韦伯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一年，行为也有所收敛了。

1884年秋，韦伯回到老家以便到柏林大学上学，虽然后来还曾至哥廷根大学学习了一个学期，但主要是在柏林求学探究。韦伯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当见习律师（1886年他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的测验并成为实习法官），后来又在柏林大学当了讲师。在此期间，韦伯继续其历史研究，并于1889年完成了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以此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

在博士论文即将完成的那年，韦伯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并在1888年加入了一个“社会政治联盟”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多数是当时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认为经济是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对当时的德国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统计研究。1890年，这个团体搞了个专题研究，目的是检验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

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而大量外国劳工则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调查研究，根据调查结果写的报告获得好评，被认为是一篇出色的观察研究报告，韦伯因此成了小有名气的农业经济专家。1891年，韦伯完成大学讲师资格论文《古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古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并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1892年，韦伯将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受“社会政策研究会”委托，分析德国东部农业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对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以此为基础，韦伯著述颇多，并开始了其对德国政治经济转型的具体分析。

1893年，韦伯与远房表妹、后来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和作家的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结婚。1894年，韦伯辞去柏林大学教职，受聘为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1896年，韦伯又转到海德堡大学教授政治科学。韦伯的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相当专制，父子关系一直比较僵。1897年，韦伯与父亲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而其父在两个月之后的一次旅行中去世了，从此，父子间永远失去了和解的机会，这使韦伯患上了失眠症，并变得越来越神经质，难以胜任教授工作。因此，韦伯不得不减少教学量，并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疗养，1900年夏秋两季还在精神疗养院休养了几个月。此后，至1903年间，韦伯因为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多次到意大利及南欧各地旅游，也基本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并于1903年秋辞去了教职。1904年，韦伯到美国旅游，并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举行的社会科学大会，对新大陆的都市和工商业的观察奠定了他研究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

辞去教职后的韦伯与同事维尔纳·松巴特创办了社会学杂志《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1904年，韦伯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一些重要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系



列论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在世时唯一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韦伯知名度最高的著作，它为韦伯研究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打下了根基。韦伯的学术进展越来越好，但他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当私人学者。1907年，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从此不必再为经济问题发愁。

韦伯是个新康德主义者，一生都希望能够参与德国政治，并努力为之，但终生也未能实现夙愿。1910年，韦伯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1913年退出学会）。1912年，韦伯试图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但最后没有成功。1916年，开始发表政论文章。1918年，韦伯加入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参加该党法兰克福选区的候选人竞选，在落选后到慕尼黑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19年，韦伯参与凡尔赛和谈中的德国代表团顾问工作，其后参与制定战后德国新宪法。1920年6月14日，韦伯因肺炎辞世。

韦伯对音乐很感兴趣，常常沉浸在音乐中以平息自己的情绪，并且有一篇未完成的与音乐有关的著作《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除此之外，韦伯一生中还有过几次有损名誉的绯闻。

雅斯贝尔斯说：“尽管由于命运和环境的捉弄，他没有在政治方面享有显赫的地位，但却毫不减损他杰出政治家本色，他的伟大就像一个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功绩但却有无限的潜力。”

韦伯生前可谓命途多舛，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其去世后才出版成书的。韦伯的遗孀玛丽安娜整理出版了多种韦伯文集，韦伯未完成的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以《经济与社会》之名在1922年出版。1974年，学术界成立了《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并得到德国研究协会等机构的经济支持。

韦伯在国际学界的闻名始于后来学者对韦伯著作的翻译研究。1927年，大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将韦伯的《经济史》译

为英文出版，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创立人塔尔卡特·帕森斯凭借研究韦伯论文的成果获得博士学位。帕森斯在1930年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出版，并且，帕森斯在其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系统地论述了韦伯的理论贡献。

1964年，在海德堡召开的国际社会学大会上，帕森斯、雷蒙德·阿隆、哈伯特·马尔库塞等名家一致认为，韦伯在社会学方面是与马克思、迪尔凯姆齐名的社会学“经典作家”。



20多年前，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传入中国大陆，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随着韦伯的许多重要著作被译介过来，人们开始了对韦伯的关注和研究，而《经济与社会》（副题《理解的社会学纲要》）是韦伯诸多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正是这本书的出版使得韦伯的思想体系获得了系统的展现。

《经济与社会》原著共两卷，英文本由多位韦伯研究专家合作翻译，并加有长篇导言和注释，于1968年出版，这使韦伯的理论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经济与社会》第一部分探讨的是“社会学范畴理论”，即所谓的抽象的社会学部分；第二部分探讨“经济与社会制度及权力”，即具体的社会学方面的问题。

正像一些中国学者所指出的，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本质的见解。首先，对社会学的定义、对象、方法及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统称为社会学的基础。然后，又分别互有交叉地阐发了他的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思



想。韦伯广泛地援引世界历史资料，把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中的经济形式、法律形式、统治形式和宗教形式纳入他独特的概念体系，分门别类地做出类型化比较研究和系统化因果分析。韦伯以现代西方社会为立足点，通过对东西古今各种文明的比较，突出以理论化为方向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特征。韦伯社会学的根基建立在理解人的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上，通过对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行为类型的比较和系统分析，达到了对特定文明本质的理解和解释。书中对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试图对社会行动的结构进行阐释。这一尝试在某些细节、方法和结论上曾引起过争议。但是，那种把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抽象理论与对世界历史的具体理解和解释密切结合起来的追求，以及韦伯在社会科学众多领域的渊博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评价。

在社会学研究方面，韦伯从横向上将社会行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生产层面即经济层面；二是政治、法律的制度层面；三就是精神、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在韦伯看来，三个层次之间不具有绝对的决定作用。所有的影响关系都是在一种相对的条件发生的。精神文化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不具备对另外两个层面的直接决定作用。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精神文化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特定时代的特定促发物。在特定的条件下，精神文化促发了制度革新，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其影响方式相当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从纵向上看，韦伯的研究成果虽多，却可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谈的是思想、观念和精神因素对人的行为所具有的激励作用；另一部分以《经济与社会》为代表，谈的是制度与社会经济行为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行为背后隐藏着的制度约束。因此，有人说韦伯的研究似

乎同时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和制度的重要性，“让人无所适从”。实际上，韦伯从感性的情感动机和理性的功利动机两方面综合强调了影响人们行为的要素；两种解释方向也是综合统一的，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化为特定的制度，从而激励和规范个人的行为，而且，制度在没有一定的文化环境时也是难以发生作用的。

韦伯的学术视野不是学究型的，大都极具现实意义。这大概缘于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志向，韦伯终身从事的学术事业都可以说是在为此做准备。韦伯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使德国成为一个现代的自由民主国家，如何把促使英国和其他欧陆国家兴旺发达的因素与德国的现实结合起来。这和中国近代学者们所走的道路是相似的，可惜中国学者对西方诸国精髓的把握还是有所欠缺，对中国国情的把握也总是落后于时代发展，故而现今的我们仍需要补课。

韦伯对工业资本主义起因的探讨，正是基于上面提到的寻找国家兴盛原因的目的。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以一种世界眼光探索着德国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韦伯首先肯定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源于西方的理性文明，源于西方世界发展出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它们具有可预见性，便利了生产核算。正是在这一新制度中，新教的“预选说”救赎理论，使人们将工作过程作为生活的目的，工作成为一种天职，成为一个人要想获得永世幸福的途径。于是基督教新教高度的禁欲精神与最强烈的现代赢利动机发生了关联，看来如此神秘而不合理的新教“预选说”，与现代营利活动中的合理经营作风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精神动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消亡，被世俗化的职业伦理所取代。其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非人格特征发展的日益显著化。换句话说，就是制度规范的超强发展使得所有个人的行为都被制度所规范，个人主观动机的强弱已经没有多少活动空间。这一点可以通



过卓别林的影片《摩登时代》获得理解，个人被各种社会制度所束缚，不得不身心俱疲地进行各项工作，工作的乐趣已经荡然无存。各种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都有赖于官僚制的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理性的市场经济，保障现代物质生产。但同时，生产的极大丰富带来了个人身心的极大疲劳，这种疲劳常常外化为一种对物质满足的疯狂追求，诸如，对高档住房、驾车和各种奢侈品的挥霍性消费。而这种对物质极限追求的心理，也被固化成压抑性的制度，进一步限制了个人行为的自由度。

这正是韦伯所担心的事情。韦伯孜孜不倦所要追求的，就是寻求社会秩序与个性发展之间的恰当尺度。因为在他看来，来自于社会理性化与个人自由化之间复杂的张力，是西方理性化能够产生和长久保持的动力。这种张力所蕴涵的是一种理性和情感之间的矛盾，其张力之强使得韦伯的精神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以至于一度精神失控。作为一名学者，他更为敏感地体验并放大了任何一名普通的现代人所体会到的痛苦。制度化扩张和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官僚体制之中，而所谓官僚体制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以没有丝毫人情味而著称。说它存在于方方面面一点都不夸张，不管是在经济企业、慈善机构还是在现代政党中都有它的身影。说它没有人情味丝毫不显夸大，它的管理依据既定规章，因为既定规章可以免于个人机会被剥夺和被赋予的随意性。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把整个社会以一种非人格化的方式组织起来，它导致个人的个性需求被忽视，但另一方面它也使社会效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在所有的领域里，官僚体制的发展和不断增强，代表着现代管理体制发展的方向。在所有的政治体制中，日常工作都是由官员们在办公机构里完成的。如果说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在技术上是最合理的，那么今天在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它已成为必然的手段。人们只能在行政管理的官僚化和外行化之间进行选择，官僚

体制化管理的优越性在于官僚们拥有专业知识。随着货物生产的现代技术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专业知识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点无论是在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是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的社会生产中都是如此。

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极大分化已经使得人们不得不依赖于官僚体制才能组织分工，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官僚制的存在也可以使生活机会不至于被垄断。因此，官僚制在实质上具有合理性。另外，由于任何社会身份的平等化都会进一步促进官僚体制化而发展，所以官僚体制会为社会平等排除原有的身份特权等级，这些特权等级以往通过对行政管理职位和资源的固定占有而享受特权。官僚制的进一步深化，也会排除依靠财产获得职位的人，使官僚体制成为大众民主不可分割的影子。

在韦伯那里，民主就是代议制民主。他认为直接民主制只适合于在较小地域内实施，如小国或居民社区。而在较大地域内实行的直接民主制会导致个人独裁统治，例如拿破仑和他的侄儿都是借助公民直接投票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代议制民主的实质是被统治者对行政管理班子的一种约束性手段，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议会中的代表拥有稳定的权力，且代表人数不能太多，这样可以做到责任明确，议事也不致久拖不决。被统治者作为公民，必须拥有受法律保护的人身自由和财产保障。如果制定决策的领导人失去了群众信任，可以被和平罢免。但要注意的是，做出决策的领导人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独断权力，否则，决策就不能合理地制定出来。

现代民主，尤其是代议制民主实际上也包容了韦伯另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概念——魅力型统治，或称为卡里斯玛型统治。议会中行为的团体即现代政党，其候选人的选举是集合了理性政纲和个人魅力的综合行为，对候选人的选择尤其倚重其个人魅力。于是，韦伯从现代社会现象出发追溯其历史渊源，总结出各种典



型形态后，又在现代民主制中将各种纯粹化了的理论类型重新整合在一起，实现了其从现实出发，又回到现实的研究初衷。



从韦伯立足于现实的理论研究中，我们能够获取对分析中国社会状况极有帮助的方法。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将中国作为东方社会的典型之一，多有论述。韦伯认为，中国没有能够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起西方的理性文明，即拥有理性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中国的统治者权力比较随意，权限范围没有明确限制，不是像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那样按照固定的契约和法则来进行。统治者可以随意征集和支配资产，这种随意性使得任何一种投资都得不到可预期的经济回报。因此，获取管理阶层的职位就成为牟利的最佳手段，这也是因为他们的财产是较有保证的。所以在中国，最划算的投资就是供小孩子读书做官或买官，韦伯将之称为政治资本主义。正是由于中国人热衷于对管理职位的投资，城市的发展就只有城而没有市，只是停留在担负政治职能的单一领域，没有发展出经济职能。这直接导致了赢利性经济行为找不到突破口，而经济发展的停滞，反过来又制约了法律体系的完善和行政管理的理性化。

在韦伯眼中，中国社会要想发展成为如西方一样的社会结构，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理性市场经济。而要建立一个理性市场经济就需要拥有一个理性的法律体系和行政章程体系，并拥有保证它们切实执行的官僚体制。但是，这样的一个官僚体制也需要制衡。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官僚体制需要被代议制民主所制衡，以保证它不至于被权力所腐蚀。

韦伯的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启发意义，特别有助于